

# 集聚发展、要素报酬递增与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广东发展经验的解读

●陆梦龙 王春宇

**【内容提要】**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能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机会。本文通过解读广东“十一·五”期间的发展经验,认为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经途径是推动经济集聚发展,但要充分获取规模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实现要素报酬递增,则必须根据各经济区域经济集聚度的高低、生产要素回报差异和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制订相应的发展战略:对高集聚地区应推动分工深化,对中等集聚地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对低集聚地区推动资本深化。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集聚 要素报酬 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670(2014)02-0016-7

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开始受到质疑。对未来增长动力机制的探讨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研究课题。其中,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论题和发展模式转换的探讨更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所在。

按世界银行2009年的标准,所谓“中等”是指人均GNI在995—12195美元之间,“中等收入陷阱”则是指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收入差距过大等原因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为何经济发展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部分研究者将其归因为分配问题,但也有部分研究者将其归因为增长问题。

本文认为“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个增长问题,而非分配问题。我们拟以广东省的情况为切入点进行探讨。

## 一、经济集聚视角下的广东发展现状及挑战

2006年广东省的人均GDP已达3509美元,2009年广东的人均GDP增至5965美元。按世界银行划定的“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为人均GDP平均在3466美元

至10725美元之间,整个广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中上等发达状态”。但用世界银行的话来说,经过近30多年的高速增长,广东正面临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更具分析价值的是,虽然整体发展水平已逼近中等收入国家,但广东不同地市的发展阶段并非完全同步,既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地区,也有面临贫困陷阱的不发达地区。因此,广东经济增长态势的梯度差异,为探究中国的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2009:重塑经济地理》从经济集聚的视角考察和总结了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节借鉴这一研究思路,以经济集聚度为指标考察广东的经济增长现状,继而从分享层面重新审视广东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 (一) 整体集聚度分析

按照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界定,严格意义上的经济集聚度测算需依据地理信息系统测定。囿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只能使用单位面积GDP(各市市辖区每平方公里创造

的GDP)这一较为粗略的指标进行定性分析;同时,用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口数)进行对比,以弥补单位面积GDP在刻画经济集聚度上的信息缺失。

图1 2010年广东各市市辖区经济集聚度和人口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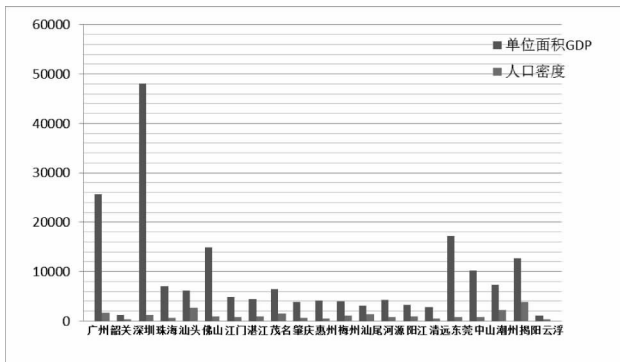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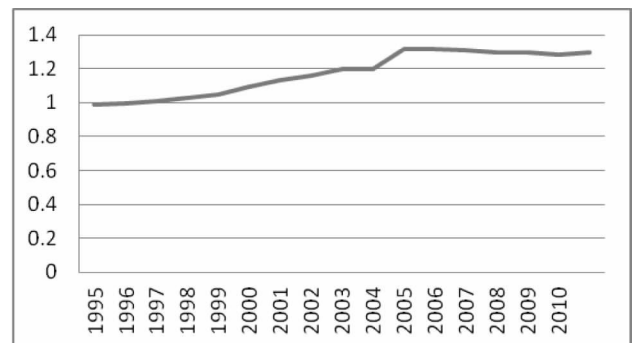
图1反映了广东经济集聚程度的几个显著特点:第一,经济总量的地理不平衡性非常显著,最高的深圳市每平方公里GDP已接近5亿元,而最低的河源市每平方公里GDP不到0.025亿元,相差超过150倍。第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已经显现,但在较不发达地区,未出现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从全省的尺度来说,深圳、广州是整个广东的中心城市,也是经济集聚度最高的两个城市;从经济区域的尺度来说,茂名是西翼地区的集聚制高点,其单位面积GDP几乎是集聚度最低的阳江的2倍;汕头是东翼地区的集聚制高点,其单位面积GDP是东翼地区平均的3倍,是集聚度最低的汕尾的近6倍。反观山区5市,相互之间单位面积GDP的差距不到0.5倍。第三,结合各市的人口密度来看,经济发达地区与较落后地区单位面积GDP的差距远大于人口密度的差距,这不仅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经济集聚发展的效果和优势。

图2以GDP变异系数为指标,考察了广东经济集聚程度的动态变化。简单地说,变异系数在此处就是衡量各市同一年GDP差距程度的一个统计量,但本文关注的重点不是具体某一年各市GDP的差异程度,而是变异系数的时序变化状况。

图2表明,从1995到2010年,广东各市经济总量的差异程度基本呈逐年扩大的态势,其差异程度表现出由迅速扩大转向平稳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1994到2000年是广东各市经济总量差异迅速扩大的时期,2001到2006年这种

差异的扩大速度减缓,从2007年开始,各市差距程度开始出现缩小的趋势。但从具体数值上可以看到,变异系数仍在1.55的高位以上。各市GDP变异系数的测量值和时序变化说明,广东经济的集聚程度自1994年以来迅速升高,但从2001年开始,经济的集聚程度开始放缓,从2007年开始,在地级市的地理尺度上,经济发展甚至出现了逆集聚的态势。

图2 1995-2010年各市(市辖区)GDP变异系数时序图



## (二) 经济集聚发展的分享效应

通过考察居民消费总额和财政能力两个指标的时序变化,研究广东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进而从分享效应的角度讨论广东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1. 居民消费总额的时序变化

图3表明,自2005到2009年,虽然各区域的经济集聚度都在迅速上升,但各区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并未出现相应的攀升趋势。事实上,珠三角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省占比反而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固然是由于东翼、西翼和山区5市由于经济增长带来居民消费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珠三角的经济集聚度、工业企业产值、就业人数等各项指标均远远高于另3个区域相加的总和,因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全省占比逐年下降实际反映了珠三角传统发展模式对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以致出现了资本品挤占消费品份额的态势。

### 2. 财政收入的时序变化

图4表明,珠三角的财政收入全省占比同其高经济集聚水平、工业企业产值占全省85%以上的经济地位并不匹配,财政收入全省占比最高的反而是远不如珠三角发达的东翼。另一方面,珠三角的财政收入全省占比呈逐年下降势头,2009年虽有所回升,但仍低于2006的水平,而其它3

个区域的财政收入全省占比则呈逐年上升势头,但2009年东翼和西翼开始出现下降势头。

图3 各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省占比时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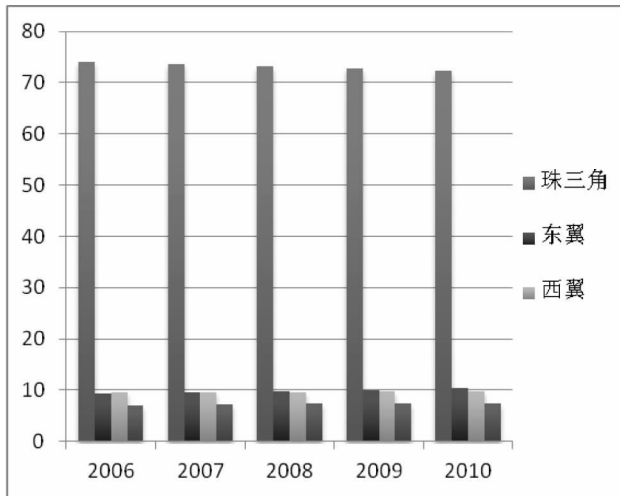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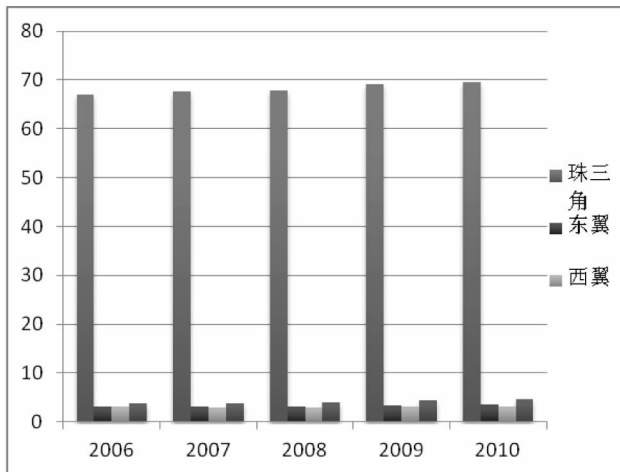


图4 各区域财政收入全省占比时序图



(三) 广东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一 对经济密度的考察表明,广东的经济集聚发展已经面临拐点。广东经济的整体集聚水平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珠三角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甚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对各市GDP变异系数的时序分析表明,广东经济的整体集聚度已经呈现出先迅速攀升,而后逐渐放缓的态势。按照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表述,这一特征只在发达国家才出现。

第二 对产业集聚状况的分析表明,对于珠三角这样经济高度集聚的地区,进一步提高产业的地区集聚已经走

到了尽头。珠三角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进行产业体系升级,用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替代传统的普通制造业。

第三 对经济发展成果分享效应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图3和图4表明,传统发展模式为了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产品分配上必然倾向于资本品的生产,这在增加资本形成的同时,又会导致消费品生产不足,政府财力难以实现相应增长,进而影响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使民众难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第四 投资驱动型高增长是以减少消费品在产出品所占份额为代价的,但资本品在产出品中所占份额的增长不是无限的。随着经济集聚度发展轨迹线拐点的即将到来,资本品的增长潜力制约进一步增强,因此对于经济集聚度很高的发达地区,投资不足以成为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二、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密度视角的梯度分析

本部分基于图1提供的数据,以经济密度为梯度划分指标,通过分析同一生产要素在不同梯度区域的不同回报率,揭示不同地区增长动力转换的现实选择,进而从推动要素报酬递增的视角探讨创新驱动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意义。

(一) 基于经济密度的区域发展梯度划分

如前所述,图1清晰地显示出广东不同地级市的梯度发展特征,为我们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增长动力提供了现实的分析案例。为使经验分析结果更加简明清晰,在广东的全部21个地级市中,本文选择了东西两翼的11个地级市作为分析样本,并依据图1将其划分为如下4个区域发展梯度:

1. 经济低集聚地区:包括清远、湛江、江门、河源、惠州,其单位面积GDP在5000万元每平方公里以下;
2. 经济中低集聚地区:包括珠海和汕头,其单位面积GDP为5000万元到10000万元每平方公里;
3. 经济中高等集聚地区:包括东莞和佛山,其单位面积GDP为10000万元至20000万元每平方公里;
4. 经济高集聚地区:包括广州和深圳,其单位面积GDP在20000万元每平方公里以上。

(二) 经济低集聚地区的增长动力机制

清远、湛江、江门、惠州和河源5个地级市均属于经济

集聚较低的地区,同时也都属于广东相对较落后的地级市。这5个地级市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均为广东推进产业“双转移”的重点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机制,各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经济学智慧,都可以总结为投资驱动,也就是:通过加大增量投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和土地的替代率,在资本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实现GDP总量的快速增长。

图5 低集聚的东线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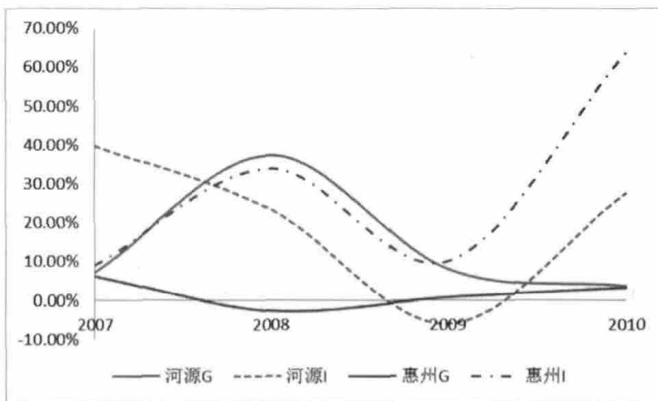


图6 低集聚的西线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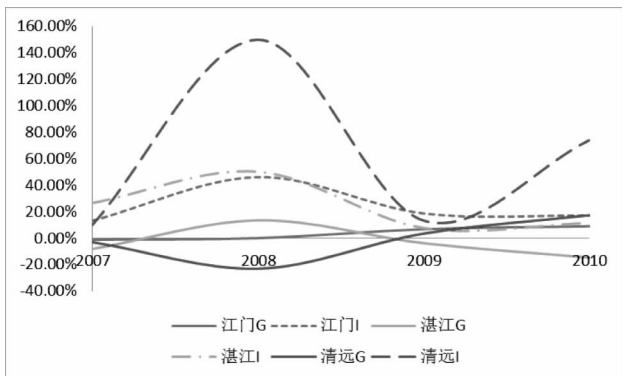


图5和6显示了上述这5个地级市2007年到2010年单位面积GDP和投资总额增长率的时序变化关系。清楚地表明:除清远外,其余4个地级市单位面积GDP的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这种正相关性在西线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很好地印证了在经济低密度地区,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

在资本自由流动和投资体制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投资驱动增长机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欠发达地区如何吸引资本。理论上来说,要吸引投资就必须提高物质资本的回报率。因此,经济低集聚区增长机制的重点在于通过完善

各项基础设施,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提高物质资本回报率。其发展路径的要点在于:抓住广东推进产业“双转移”的政策机遇,通过“两步走”提高传统产业的物质资本回报率。第一步是借助产业梯度转移的发展机遇,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并逐步提高这些产业中的资本密集率;第二步是对于这一区域中经济密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发展资金密集主导型的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使之成为制造业的核心产业带。

#### 1. 经济低集聚区域的产业转移

2008年5月颁布的《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提出将珠三角的传统产业转移到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湛江、清远、江门、河源和惠州都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先通过成本优势吸引资本“进得来”,再通过提高利润率使资本“留得住”;先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再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增大资本密度,提升改造传统产业,使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产业集聚紧密结合,由此提升物质资本回报率,吸引投资,为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或梯度式发展提供动力。在具体政策实施上,清远、江门市以着重整合传统制造业为核心,湛江、惠州市则以提升传统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为核心。河源市的则着力接纳资本密集度很高的电子制造业。

#### 2. 经济低集聚地区的产业升级

在产业升级方面,经济低集聚地区或是通过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发展,或是通过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推进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发展,以此实现从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的过渡。在具体政策实施上,清远、江门、河源的主要经验是升级传统制造业,湛江、惠州则重在发挥高资本密度的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

总之,广东的经济低集聚地区的增长机制可以总结为:以加大投资为驱动力,通过产业集聚发展提升物质资本回报率,实现资本深化型经济增长。

#### (三) 经济中等集聚地区的增长动力机制

经济中高密度地区的东莞和佛山是广东乃至全国有名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化城市,其经济规模总量和人均GDP一直处于全省21个地级市的中上游。珠海经济规模总量较小,但人均GDP在广东21个地级市中位居第4。相对于上述经济低密度地区,佛山、东莞的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当前正处于由加工工业和初级制造业向大工业和先进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深化转型阶段。依据经济学中

的边际报酬递减律 这类经济密度较高地区的物质资本报酬率的已经难以进一步提高 现有制造业体系的集聚程度也难以进一步提高。

图7 经济中高集聚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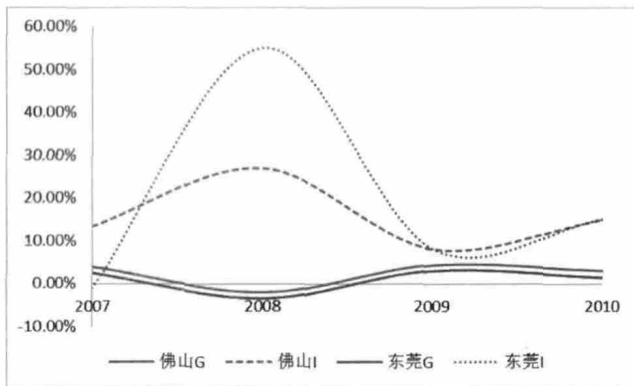


图8 经济中低集聚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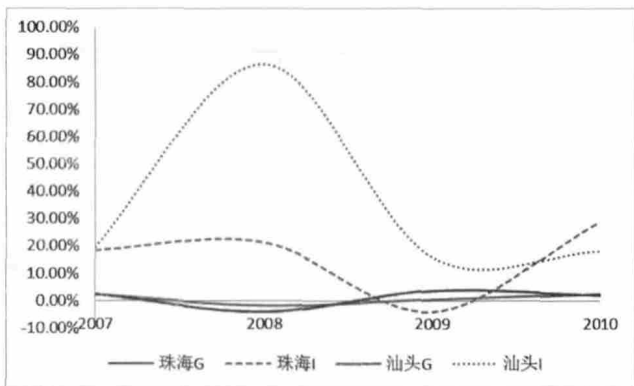


图7和图8表明 对于经济中等集聚地区来说 投资对于单位面积 GDP 的推动作用已经大为减弱。可以看到, 对于经济处于中高等集聚程度的东莞和佛山而言 投资增速曲线与单位面积 GDP 增速曲线呈非常弱的正相关性甚至负相关; 对于经济处于中低等集聚程度的珠海和汕头而言 投资的加速推动作用同样并不明显。

对于经济中等集聚地区的增长机制 目前并无一致认可的模式。本文在总结4个城市经验的基础上 将其增长动力机制归结为: 提高供给量相对固定的土地的投资回报率, 而提高土地投资回报率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推动产业的区域集聚发展。

图9和图10显示了东莞、佛山、珠海和汕头4个地级市2007年到2010年单位面积GDP和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的时序变化 清楚地表明经济中等密度地区通过地区集聚发展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图9表明 经济中高集聚

区的佛山和东莞的建设用地增速与单位面积GDP增速呈较弱的正相关性; 图10表明 经济中低集聚区的珠海和汕头建设用地增速和单位面积GDP增速呈较强的正相关性。

图9 经济中高集聚地区土地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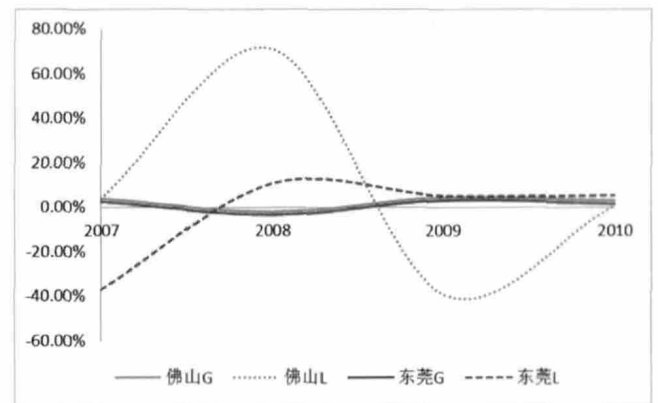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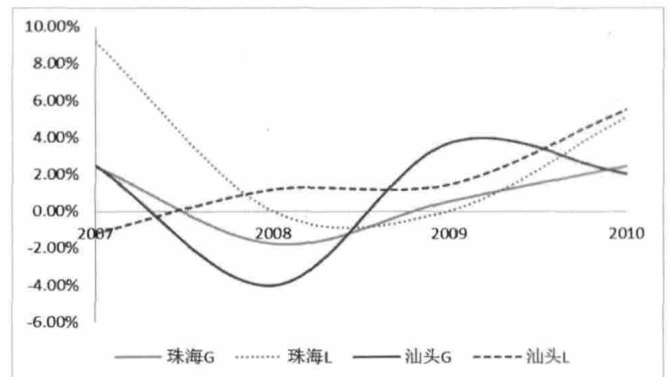


图10 经济中低集聚地区土地效果



对应于这一增长动力机制的发展路径的要点在于: 从投资回报率和规模报酬两个方向提高土地投资回报率。提高土地投资回报率的主要方式是推动产业结构的深化升级, 获取土地规模报酬的主要方式则是推动经济结构的区域集聚。

1. 以产业结构深化升级提高土地投资回报率

如果说经济低集聚地区发展现代产业的着眼点在于其所具有的资金密集特点 那么经济中等密度地区发展现代产业的着眼点应该在于其所具有的高附加值特点。通过对原有产业体系的深化升级 构建具有高产值和高附加值特点的大工业体系 可以有效缓解经济增长对土地的需求压力 为经济中等集聚地区的持续较快增长提供动力源泉。在具体政策实施上 对于传统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珠海 主要采用植入方式直接引入高端制造业; 东莞着重通过加工贸易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佛山则强调以信息化

带动产业结构深化升级。

2. 推动区域集聚发展以获取土地规模报酬

就政策层面而言 推动区域集聚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城市主题功能区的规划和建设。东莞、佛山和珠海的发展经验表明 主题功能区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通过物流业的发展和产业纵向一体化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服务联系成本,还表现在可以通过提高工业用地的集约化程度提高土地的规模收益 并减少因土地权属不明晰带来的交易成本。在具体政策实施上 东莞和珠海所采取的政策是通过打造港口园区推动区域集聚发展,而佛山的着力于通过突破行政区域设置推动区域集聚发展 通过区域组团加快资源优化配置 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整合和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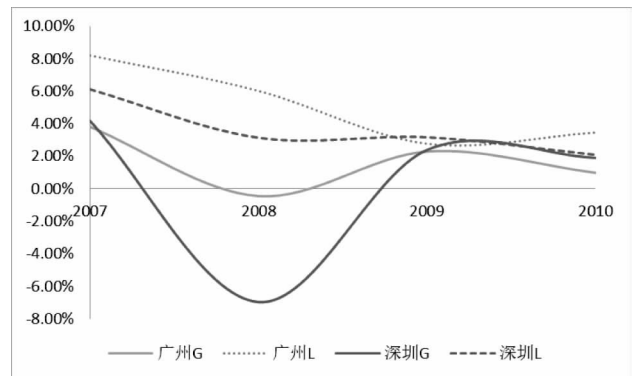
总之 广东的中等经济集聚地区的增长机制可以总结为:以土地集约化利用为驱动力,通过产业深化升级和区域集聚提高土地报酬率,以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增长。

(四) 经济高集聚地区的增长动力机制

就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而言 广州和深圳无疑是广东的领军城市,但这两个城市目前都面临巨大的发展挑战。对于深圳而言 对比世界银行 2009 年报告所提供的数据,深圳的经济密度已经和东京、纽约处于同一个水平线;对于广州而言 其经济规模总量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居全国第三位。京、沪 以及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业已表明 投资驱动或者土地集约利用已经不足以成为支撑经济高集聚地区持续增长的动力。

本和土地对于推动广州、深圳两市单位面积 GDP 增长的作用。图 11 表明 广、深两地的投资增速甚至已经与单位面积 GDP 的增速呈负相关。图 12 则表明 深圳建设用地面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越来越小;广州自 2009 年以来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速在增加,但单位面积 GDP 的增速却在下降。

图 12 土地对广、深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对于经济高集聚地区的增长动力机制 理论和政策研究都归结为创新驱动。而要实现经济的创新驱动型增长,首要条件就是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说 这意味着要分化出知识生产部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 2009》从经济集聚发展的视角指出,“集聚经济的类型随着发展的推进而变化。随着知识在经济中基础作用的增强,以毗邻为条件的知识外溢就显得尤为重要。”

图 11 固定资产投资对广、深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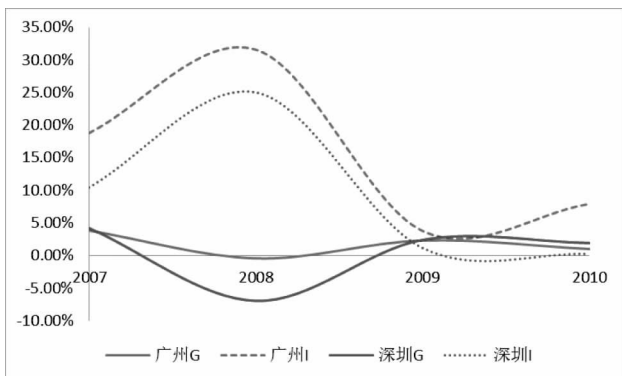


图 13 科研人员数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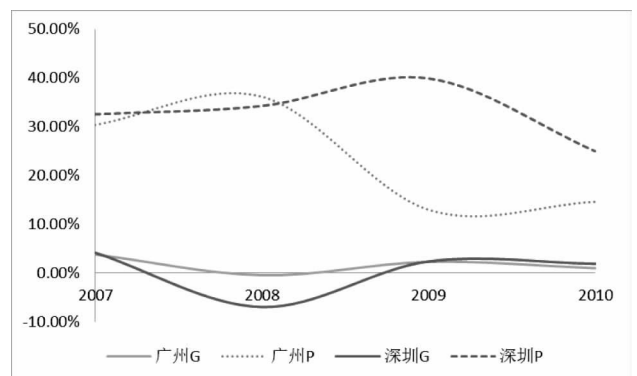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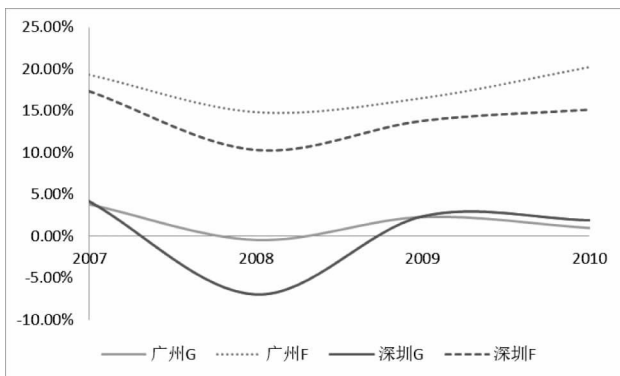


图 11 和图 12 分别显示了 2007 之 2010 年以来 物质资

图 13 和图 14 从研发人员数量和研发经费两个指标考察了知识生产部门投入对单位面积 GDP 增长的推动作用。图 13 表明,广州和深圳的科研人员数量和单位面积 GDP 的增速均呈正相关。图 14 则表明,广州和深圳的科研经费和单位面积 GDP 都呈现较快增长势头,且与单位面积 GDP 增速呈正相关。

图 14 科研经费数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对应于这一增长动力机制的发展路径的要点在于: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通过“三步走”实现经济的创新驱动增长。第一步是借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吸引高素质人才,第二步是通过高素质人才推动创新体系和知识生产部门的建立和发展,第三步是通过发展知识经济最终实现经济的创新驱动型增长。

在具体政策实施层面,保障和推动经济的创新驱动型增长现在仍处于探讨阶段。总结广州和深圳两地的经验,其共同点都是首先强调要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增长的实体经济支撑。在知识的分配和应用方式上,广州作为广东的政治、文化中心,侧重于建设政府主导的专业知识生产部门,更着重发挥知识的外溢效应;深圳则侧重以产业集群为载体建立技术创新中心,以高新技术的研发驱动经济的创新型增长。

总之,广东的高经济集聚地区的增长机制可以总结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报酬率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 三、简要的政策总结和建议

总结上述广东的区域梯度发展经验,本文认为,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构建应根据区域所处发展阶段有所侧重。

经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都指出,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来自于要素报酬递增。因此,增长动力机制的相应政策探讨也应围绕生产要素的回报率展开,以符合经济梯度发展的客观规律。

广东的发展经验表明,对于经济低集聚地区而言,推动经济增长效果最显著的生产要素是物质资本;对于经济中等集聚地区而言,推动经济增长最有力的动力是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对于经济高集聚地区而言,唯有创新才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循此思路,要实现经济的创新驱动增长,就必须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因为创新驱动最重要的源泉是知识和技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围绕这一论题的政策探讨很多,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方面包括两点:

第一,改变“轻劳动重资本”的收入分配格局。增长机制和分享机制密不可分,在投资驱动型增长机制中,国民收入的分配倾向于物质资本所有者;而在创新驱动型增长机制中,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创造力,这就要求必须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保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使劳动者能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二,改变“轻制造业重服务业”的发展思路。创新驱动型增长同样需要产业体系的支撑。国内外学者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的研究表明,创新驱动型增长不能仅仅着重于虚拟经济部门的组织创新,同时还应做到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并重,因为实体产业的增长才是经济体持续稳定增长的物质源泉,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提高才能由此而落到实处。

### 参考文献

- [1] 赵丽红,2010,“资源诅咒”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当代世界出版社,北京
- [2] 袁富华,2012,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经济研究》,第3期,P. 127-140
- [3] 陆梦龙、谢珣,2013,经济结构演进的国际经验比较——基于 Kohonen 算法的数据探索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 351-366
- [4] 广东统计年鉴(2000-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  
(责任编辑:陈俊艺)